

中华五千年史话

隋唐春秋

☆ 秦惠民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ZHONGHUA
WUQIANNIAN
SHIHUA

☆ SUITANGCHUNQIU



前 言

吴廷俊

羲轩造书契，今始五千年。

我们伟大祖国的文明史已经五千年了。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辉煌史、屈辱史、反抗史。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西方人望尘莫及的古代文明。10 世纪以前留下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至今还令人叹为观止；古代的桥梁、塔寺及园林建筑，其造型之优美，结构之巧妙，技术之复杂，令人叫绝；古代的瓷器和漆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还是制造工艺都极为精致，被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视为珍品。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其高深的学术造诣、渊博的思想内涵、完整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使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总之，无论是物质文明方面，还是精神文明方面，中国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公元 16 世纪至鸦片战争前 300 年历史，是一段衰落史。16 世纪中期中国开始由盛转衰。17、18 世纪，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先后建立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里徘徊；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的时候，中国的封建专制仍旧猖獗肆虐；当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美、大工业经济在西方长足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农本经济的水平上。历史进入 19 世纪时，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明显拉大。短短的三百年，中国在封建主义泥潭急剧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一百一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千余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深渊。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一天停止反抗，一部近现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斗争的历史。从 1841 年三元里人民抗英，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前仆后继，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国家的独立。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就是要把我国历史当成镜子，既要记住我国古代的辉煌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与勇气；也要记住我国的衰落史、屈辱史，增强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在古代辉煌的基础上，创造出当代的辉煌来。

不忘祖先，不忘历史，不忘光荣，也不忘屈辱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不可战胜的民族。



杨坚受禅称帝	1
独孤皇后妒与贤	6
杨广施奸夺位	10
运河工程	14
三使台湾	18
隋炀帝三幸江都	21
隋相高颎	26
义师蜂起	31
李渊称帝	35
玄武门之变	40
贞观之治	45
唐玄奘西行求法	49
文成公主入藏	54
武则天称帝	58
酷吏来俊臣	64
韦后专权乱政	69
开元之治	73
名相姚崇	78
安史之乱	83

马嵬兵变	86
鉴真东渡	93
奸相李林甫	98
名将郭子仪	104
甘露之变	110
牛李党争	115
会昌废佛	120
黄巢起义	125
朱温称帝	130
李存勖三矢定江山	135
幽蓟十六州	140
歌声才歇便兴嗟	145
孟昶治后蜀	150
李昇化家为国	154
可怜薄命作君王	159
周世宗柴荣	163

杨坚受禅称帝

杨坚（公元541年—604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祖籍武川（今属内蒙）。父名杨忠，是西魏12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后仕北周，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

杨坚于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公元541年）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音bō rě）寺，14岁即任京兆尹功曹，15岁以父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并晋封成纪县公。由于他年少勋高和“貌有反相”、“恐非人下”之嫌，故招致北周统治集团的猜忌。武帝宇文邕在和叔父宇文护的争权斗争中，依靠杨坚的实力地位和杨氏家族的影响，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杨坚的恩宠不衰，未尝不是宇文邕的回报。但宇文邕对他亦有戒心，知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故采取许多怀柔笼络之策，使其为己所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太子宇文赞（音yūn）纳杨坚长女为妃，这种政治联姻，使2人在君臣之分以外，又结成儿女亲家，为宇文政权的长治久安，拴上一条姻戚纽带。从这一举措，可以看出宇文邕的良苦用心。

大成元年（公元579年）杨坚之婿宇文赞即位，是为宣

帝。杨坚以皇后之父的身份晋封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又升任大后丞、右司武，不久再擢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均由杨坚留守京师，统摄朝政。从此威望渐隆，外戚擅权之势已成，主弱臣强之局已定。宇文赧之与杨坚，虽有君臣之义，翁婿之情，仍惴惴不安，“颇以为忌”。加之后宫四妃争宠，彼此相谗；而杨后之尊，又成为众矢之的。起初，宣帝还能明是非，分曲直。以后因毁语日多，是非莫辨，常怒斥皇后道：“必杀你全家诛你九族”一次宣帝召杨坚以议事为由，察其神色，验其忠奸，谓左右曰：“杨坚入宫，若有惶惧之色，即杀之。”杨坚见宣帝之后，神色自若，仪态安详，才免遭杀身之祸。此后，宣帝昏暴日甚，喜怒无常。一天借故将杨后赐死，逼令自缢。幸因杨坚之妻独孤氏入宫求赦，叩头流血乃免。杨坚虽百般韬晦，仍情不自安，就向昔日同窗，时任内史上大夫宣帝宠臣郑译求助说：“我求外任以苟全，望公相机相助。”恰值宣帝欲委郑译伐陈重任，筹划征服江南事宜。郑译借机要求杨坚参与，担任扬州总管，总领伐陈军事，得到宣帝首肯。临行之日，宣帝忽得暴病，急召刘昉、颜之仪等亲近大臣，入宫托付后事。杨坚见朝政不稳，以病足为由，留京以观事变。宣帝弥留之际，口不能言，无所嘱托。刘昉见太子甚幼，就与郑译合谋，矫称宣帝诏命，命杨坚入宫辅政，总管中外兵马大权。宣帝病逝后，刘、郑二人秘不发丧，俟杨坚调兵遣将，部署就绪之后，才讣告朝野。杨坚于大象二年（公元851年）5月24日扶植宇文阐即位，年仅8岁，称为静帝，改元大定。杨坚自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军政大权后，第一要务就是铲除北周宗室势力。6月4日以千金公主远嫁突厥为由，将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

陈王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逖（音 yōu）5 人召至京师，均以谋逆之罪于同年 6 月、7 月、11 月先后诛杀。至此，杨坚牢牢控制了北周大局。此后虽有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郢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反叛，均被杨坚迅速平定，无伤大局。杨坚于北周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2 月受禅称帝，改元开皇，仍都长安，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坚原承父荫，曾封“随国公”，因改朝号为“随”，又恶“随”字带“走”，故将“随”去“走”为“隋”，称为隋文帝。杨坚从矫受诏命入朝辅政，到代周称帝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其得国之易，在改朝换代史中，是无人与之相比的，故历代史家叹为异事。

杨坚立国之后，颇能勤政。史称杨坚每日平明听朝，日昃（zè）忘倦。五品以上官员，均使之论事；由于论事时间过长，就命宿卫传餐朝堂而食，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外出察访，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询问，诸如官吏为政之得失，百姓生活之疾苦，均在察访之列。为了惩治贪官，他往往派人伪行贿赂；受贿者则处以死刑，且亲自临决。开皇年间，关中地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他派人至民间察看百姓所食何物，有得豆腐杂糠回奏，杨坚流涕展示群臣，并引咎自责，减损御膳，一年之间不食酒肉。还让关中饥民就食河南，泽及万民，堪称义举。

杨坚的俭朴之风，亦为世称颂。史称杨坚“居处服饰，务在节俭。”隋宫嫔妃，均着多次浣濯之衣。车马服饰破敝，补缀而用，不得新制。杨坚平日御膳，荤食只限一肉，素菜数碟而已。开皇十五年（公元 595 年），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纹布匹，杨坚命焚毁于朝堂之上。此后，再无贡物邀宠之徒，

敢于效尤希宠。俭朴之风，上下相化，在开皇、仁寿之间，官吏均不穿绸缎，不饰珠宝；常服多为布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角制品而已。这种俭朴之风的形成，虽有“齐之以刑”的因素，但杨坚本人的榜样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杨坚建国之后，宽恤民力，轻徭薄赋，采取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政权。开皇元年，即位伊始，就将官牛 5000 头分给贫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第二年又颁布均田租调的新法令，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80 亩，“永业田”20 亩；妇女受露田 40 亩。永业田永为受者私有，露田在受者死后必须归还。还颁布“轻税入官”政策。“轻税”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入官”就是整理户籍，把所纳税物农户从地方豪族手中转为国家税户。开皇三年下令将百姓成丁的年龄由 18 岁推迟到 21 岁；丁男服役期限，由 1 个月减为 20 天。每户调入国库的绢由 1 匹（4 丈）减为 2 丈。这种富民政策，不到几年使隋朝仓库充盈，民康物阜。《隋书·食货志》就记载当时“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师“帑屋（钱库）既充，积于廊庑（室外走廊）之下。”隋文帝因之停征赋税，“以赐黎元”。这种雄厚的物质基础，为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

隋文帝即位不到 1 月的时间，就任命声名素著的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总管、贺若弼为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共同筹划平陈之事。其时因突厥为患，北方未安，无暇用兵南国。至开皇八年（公元 588 年）隋文帝才下令出兵，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并任行军元帅。杨广从六合（今江苏六合）、杨俊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杨素从信州（今属四川）等地共征集地方总管 90 人，发兵 50 余万，由晋

王杨广统一指挥。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贺若弼由扬州至京口，韩擒虎由庐江至采石，形成钳形攻势，夹击建康。2月城破，韩擒虎率先入城，俘陈主叔宝，陈朝宣告灭亡。从西晋末年延续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中国复归于一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杨坚一生自奉甚俭，在封建帝王中实不多见，但晚节有亏。开皇十三年命杨素监造仁寿宫。其规模宏丽，《隋书》记载不详，唐初魏徵所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有详细描绘。谓其“栋宇胶葛，台榭参差”，“珠壁交映，金碧相辉。昭灼云霞，蔽亏日月。”宫成，文帝命高颍察视。高颍回奏八个字：“颇伤绮丽，大损人丁。”总之，劳民伤财太甚。文帝因之甚为不悦。杨素甚为忧惧，乃叩请独孤皇后斡旋，说什么天下一统，功高日月，造此一宫，算不上什么耗费。杨坚是个极怕老婆的皇帝，皇后这么一说，他只得高兴起来，及去游观，又圣意大悦，奖钱百万，锦缎三千匹，杨素才祸中得福。开皇二十年废去任性奢华的太子杨勇，立矫为俭德的次子杨广为太子。故史家认为，隋朝的“乱亡之兆”虽然成于炀帝，但文帝已开其端。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卧病于仁寿宫的文帝，在杨广、杨素的控制之下猝然死去。据称，是二人谋害的结果。

独孤皇后的妒与贤

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惧内之甚者，莫过于隋文帝杨坚。

杨坚的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的掌上明珠。独孤信因见杨坚生有异相，英俊奇伟，知道以后贵不可言，就把爱女嫁给他。二人结成伉俪，恩爱异常，并立下誓言：“誓无异生之子”。如果把它理解为夫妻二人忠贞不渝，永不移情别恋，这未尝不是人世间的一种纯情美德；但从立誓后的情况观之，誓言似乎专对杨坚而发。不准他拈花惹草，纳宠藏娇。禅代之前的杨坚不仅摒绝女色，就是禅代之后已成一国之尊的杨坚，面对无数的后宫佳丽，亦罕有亲近的机会。无怪杨坚曾以自豪的口吻对群臣说：“朕别无姬妾，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是真正的骨肉亲情。不像前代君王有许多内宠，异母所生之子，必然有夺嫡争权之衅，导致亡国之祸。”不过杨坚晚年亦有耽乐之举，劳民伤财而修建的离宫别墅仁寿宫，即是他的俭德“鲜克有终”的表现。他在独孤皇后生前的“偶幸女色”，也是发生在仁寿宫里的事情。

尉迟迥的女孙，因美色而选入后宫多年。在长安宫中，或

因恪守“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或因独孤皇后的严加防范，杨坚一直似乎无视她的存在。尉迟氏转入仁寿宫后，杨坚“见而悦之，因此得幸”。独孤皇后侦知其事，妒性大发。在杨坚临朝议政之时，率领嫔妃仆役，将尉迟氏鞭笞至死。这件事对初幸宫女的杨坚来说，是警告其下不为例；对媚君求宠的宫女来说，是以儆效尤，其核心问题，则是保护自己的专宠地位。从独孤皇后立场言之，于情于理也未可厚非。杨坚回宫即临尉迟氏寝处，见到的却是一具僵尸，虽然怒不可遏，但慑服于河东狮吼之威，未发一言，一气之下，独自离宫出走。杨坚一人骑着马从后苑出门，不择路径，信马所之，只觉苍茫一片，暗淡无光，马前的一抹斜晖，尚可分辨林木的高下，就是在这种混沌的感觉中，竟深入荒山野谷20余里。仁寿宫中却因丢了皇帝，闹得天翻地覆，幸亏高颍、杨素二位大臣，问清原委，查询踪迹，追随之至。君臣三人深山荒野晤面之后，面面相视，不发一言，惟有唏嘘而已。在二位大臣看来，这毕竟是皇上家事，疏不间亲，评判谁是谁非呢？在皇上看来，身为万乘之尊，竟然不能保全所欢女子，是一种奇耻大辱。如泣如诉的虫鸣声，似乎渲染了相对无言的悲凉气氛；林中传来“不如归去”的鹧鸪声，又增强了徒唤奈何的叹息。驻马良久，杨坚才仰天长叹说：“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亲近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吗？”这话像是自问，又像是在问高颍、杨素二人。高颍乘机劝慰说：“陛下不能因一妇人而轻天下啊！”杨坚在山中徘徊良久，在高、杨二臣的劝说之下，深夜才回到宫中。独孤皇后虽迎于阁内，置酒相欢，但始终未认阴杀宫女之过。在她看来，一个女子不管是贵为皇后还是贱为民妇，均应保护其专宠地位，何况杨坚和她还有

“誓无异生之子”的盟约呢？

独孤皇后的这种妒性，不仅仅发泄在杨坚身上，对她的五个儿子也是防范有加，诸子之中有妾怀孕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她对太子杨勇的家庭生活，尤为注意。史称太子杨勇多宠妾，正妃元氏，是皇后亲自选择的爱媳，可太子爱薄恩疏，而对偏妃云氏昭训，宠幸倍加，一切礼仪恩赐均优于元氏。不知是元氏素有心疾还是失宠的家庭生活抑郁而成，心病两日即溘然长逝。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昭训阴谋毒杀，耿耿于怀，从此认为太子德行有亏，不堪君临天下。在次子杨广的多方挑拨之下，遣人伺其过失，让杨坚废太子杨勇为庶人。

高颖是杨坚的股肱大臣，和独孤皇后的父亲过从甚密，待字闺中的皇后对高颖礼遇甚殷。高颖夫人死后，纳妾生男，独孤氏以为不忠于原妻，督使杨坚借故将高颖罢官归里，在妒妇史中实属罕见妒例。史称独孤皇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杨坚）斥之。”所谓“诸王”，是指她的五个儿子，行使家规母训，禁止儿子纳妾生子，有理可言。至于“朝士”，乃朝中大臣，在多妻制的封建社会中，纳妾生子，要遭到丢乌纱帽的惩处，实属罕见之事。由此可见，独孤氏是封建社会中一夫一妻制的捍卫者。

独孤皇后除“性尤忌妒”之外，还有贤明达理不让须眉之处。有一次名叫阴寿的幽州总管将一匣价值 800 万的明珠献给独孤皇后，她义正辞严地说：“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突厥为患，生民涂炭，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抗敌辛劳备至，不如把这匣明珠，分赏给有功将士。”将士闻之，欢呼万岁。百官闻之，赞誉备至。皇后与文帝，恩爱异常。史称“同及宴寝，相顾欣然。”杨坚每次上朝，皇后一定随辇送到

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对杨坚施政“多所弘益”；但她从未擅权干政，总是让杨坚知其错而改之，自己暗藏幕后，弼违匡谬，是正非讹。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他是皇后亲戚之故，欲赦其死罪。皇后闻之正色说：“国家大事，按律处之，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崔长仁则依法处死，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当时传为佳话。皇后的同父异母之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皇后，依律当处死刑。皇后为此废食三日，向文帝求情赦免。她说：“陀若犯蠹政害民之罪，妾决不为之求情。今因咒我而处死，妾心不忍，请免他一死。”独孤陀因之减去死刑。这种公私有别、恩怨分明、通情达理的豁达行为，满朝文武为之折服，故当时“宫中称为二圣”。史称文帝对独孤皇后“甚宠惮之”，即是说对她又爱又怕，这话是有道理的。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独孤皇后逝于永安宫，年仅50岁。此后，文帝宠幸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上颇惑之，由是发疾”。即是说因耽宠女色而伤龙体。到病危之时，文帝对侍臣说：“若皇后在世，我不会落到这种贪色亡身的境地啊！”杨坚此话，可以说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杨广施奸夺位

隋文帝杨坚禅位之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坚有五子，鉴于北周王室势孤力薄而亡的历史教训，便封诸子为王出任各州“总管”，平时管理地方政务，战时为行军元帅，保国勤王。杨坚这种治国谋略，是寄长治久安的厚望于诸王身上。惜乎事与愿违，诸王坐大擅威，太子势反卑弱，是隋朝速亡的致祸之源。这是杨坚始料未及的。

太子杨勇被废，一因“率性任情”，恶习昭著；二因宠爱云妃，失欢母后。但他遭废的主要原因，则是晋王杨广施奸夺位的必然结果。

杨广，是杨坚的第二子。史称“弥自矫饰”极善伪装。他侦知父皇母后对太子的俭朴仁孝有亏、奢侈淫乐无度行为严加责备之后，便将自己伪装成俭朴仁孝的化身，不近声色之娱的圣者，以取悦于父母。为此，他每次自扬州来京，衣敝服、乘旧车、驭驽马、使老仆，对父母嘘寒问暖，恪守人子之道。他得知朝中对太子亲群小而疏大臣颇有微辞，故每次来京必拜见权臣显宦，卑辞屈礼，貌极谦恭，赢得满朝的赞誉。每次离京之前，一定进宫辞别母后，演出一场场依依惜

别的滑稽剧。一次，他辞别母后时呜咽地说：“儿臣就要回扬州镇守有限之地了，一想到要离开父母，恋亲之情便油然而生。离开此地，不能晨昏侍奉，痛苦至极。再拜之期，又不知是何日何时啊！”说完以后还俯伏在地，装出涕泗横流、哀伤至极之态，使得老母也“泫然泣下，相对嘘唏。”母后动了感情，泪流满面地说：“你守方镇，我住京师。我已老迈，不知今日别后，能有再见之时否？”杨广见到自己的表演已收成效，便施展谗毁太子阴谋。他故作委屈哀伤之状对母后说：“儿臣性本愚钝，十分看重兄弟手足之情，但不知因何得罪于兄长，失爱于东宫。他衔恨在心，欲加屠戮，使我成天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担心祸从天降，不能嘘寒问暖于双亲之门。”皇后闻之怒不可遏地说：“犬子行为令我难耐。我为他选择元氏为妻，是为了杨家基业的兴旺发达。他竟不和元氏做真正夫妻，却宠幸阿云（云妃昭训）。元氏本无病痛，忽然暴亡，定是遣人投毒，致此夭亡。事已如此，我未加苛责。今天对你又怀不轨之心，怎能漠然不理呢？我活着的时候，他竟如此放肆；我死之后，岂不鱼肉相待么？”皇后越说越急，越急越气，最后竟气极败坏，说不出话了。杨广出宫之后，以手加额，庆幸自己的成功表演。

杨广这次来京，潜毁了太子，美化了自己；动摇了东宫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回到扬州以后，便加速施展夺位之谋，与扬州总管司马张衡、寿州刺史总管宇文述共谋其事。宇文述曰：“废立之举，国之大事。它动摇父子骨肉亲情，易起兵戈杀戮之祸，必须要有肱股大臣，能左右圣意者与之合谋，或能成事。今朝臣之中对皇上能施影响的惟有杨素；而杨素之谋士乃其弟杨约。我与杨约旧有交往，请朝京师，与之结纳，共图

其事。”宇文述携巨金至长安与杨约酣饮博戏，每博佯输，杨约尽得其金，起而称谢。宇文述因而对杨约说：“此乃晋王赐公之物。”杨约问：“这是何为？”宇文述尽申废立之意。杨约归与杨素说：“今太子失爱于母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兄此时能建大功，则可长保荣禄。一旦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了。”杨素本为凶险之徒，闻之大喜说：“我的智思，怎么想不到这一点，幸好你启发了我。”杨素借入宫侍宴之机，称誉晋王孝悌恭俭，以揣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极是，此儿大孝，每闻皇上和我遣使将到，必迎于境首。谈到与父母分离，无不泣下。不类勇儿，只知酣饮游乐。我深恐他谋杀其弟哩！”杨素乘机诽谤太子种种不肖之举，皇后由于杨素话语投机，赐金赐物，更加坚定了她的废立之愿。杨坚在仁寿宫，命杨素往东宫观察太子动静。杨素故意使勇良久以待，激怒于他。杨素回奏说：“太子怨望之情，形于颜色，恐有他变，望严加防察。”皇后又遣人窥伺东宫，行介之事，亦加夸饰，构陷其罪。文帝惑于邪议，遂对杨勇疏远猜忌，从玄武门到至德门，派人监候，防其动乱。又将太子侍从，斥去健儿，只留老弱以供驱使。晋王又令亲信段达结识东宫幸臣姬威，赂以重金，令察太子动静密告杨素。姬威乃出首状告太子意在追求奢侈，欲将樊川（今属陕西）至大散关大片土地辟为苑囿。并诬陷太子曾说：“皇上每责我嫔妃过多，和陈叔宝相比，还差得远哩。”还诬告太子传巫者卜筮之言说：“至尊忌日（文帝死期）在开皇十八年，此期甚近。”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文帝召集百官宣布废除杨勇太子之位时说：“此儿不堪承继基业已久，皇后劝我废之，我望其悔改，隐忍至今。我虽德惭尧舜，终不能将杨氏天下付此不肖之子。我常害怕他加害于我，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文帝使人召杨勇于武